

大洼文史资料

第八辑

二界沟渔村史专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洼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大洼

前 言

二界沟地处辽东湾北岸,临沟面海,以盛产毛虾、文蛤、海蜇等水产闻名省内外,是大洼县内年产万吨海产品的渔业重镇。渔史悠久,但史料不全。为了不割断历史,挖掘与整理地方史料,使人们了解这个滨海渔镇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进一步发展渔业生产,繁荣经济,为改革开放服务,我们编辑了这本专集。

本《专辑》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渔村的形成;(二)渔村的生产发展;(三)渔村的组织机构;(四)渔民的遭遇与生活状况;(五)渔村的风物与习俗。主要是反映二界沟解放前的渔村概貌。

本《专辑》的资料由刘则亭同志供稿,又查阅了营口、海城、盘山、大洼的志书以及伪康德三年二界沟渔会《会务年报》,经于凯同志整理。

在组稿和审阅的过程中,陈东白、王树勋、刘则亭、冷晓光、吴永明、杨少岐、张朝盛、高永年、董树芝、于化成、李凤春、黄述颜等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建议,特别是二界沟镇党委、政府和盘锦市边防局给予大力支持。对此,谨致以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疏漏难免,望不吝赐教。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12、1

二 界 沟 渔 村 史

一、二界沟渔村的形成。

1、二界沟的由来。

二界沟地处辽宁省大洼县西南部，面临渤海，背靠滩涂，以盛产毛虾、文蛤、海蜇闻名遐迩，兼产一些剪扣、大头宝、鲨鱼和海蟹等水产品。二界沟系海水潮汐一大潮沟，沟宽水阔，渔船出入海方便，是辽东湾的天然渔港之一。

二界沟原名为西大沟，在清朝时沟西为广宁府界，沟东当时为海城县辖，一沟分两界。但那时群众不太清楚。一天，西大沟漂来一具尸体，被沟东人发现，禀报海城县衙。县官坐轿而来，到此一看，尸体在沟西，不属海城县辖，便扬长而去。从此群众把西大沟称为二界沟，一直沿用至今。

2、渔村的沿革与发展。

二界沟地处大辽河、双台河入海处，随河水下泻有丰富的鱼虾饵料，海、河水混合，适应鱼虾生殖繁衍，是辽东湾的天然鱼场。这一渤海金滩，很早就被渔人发现。祖国中原各地渔民都闻名而至。据一九五八年石灰厂烧石灰挖出一大贝丘，专家考证是距今很古、很古。可见很早就有渔民在此生产和生息过。在南甸子东北二十多华里处曾有一座霸王庙，此庙在土丘上，有一眼甜水井，相传是唐王李世民征东时喝过这口井的水，从而得名“圣井”（此井于一九五八年挖养鱼池时废掉）。至明朝中叶，二界沟就成为各地渔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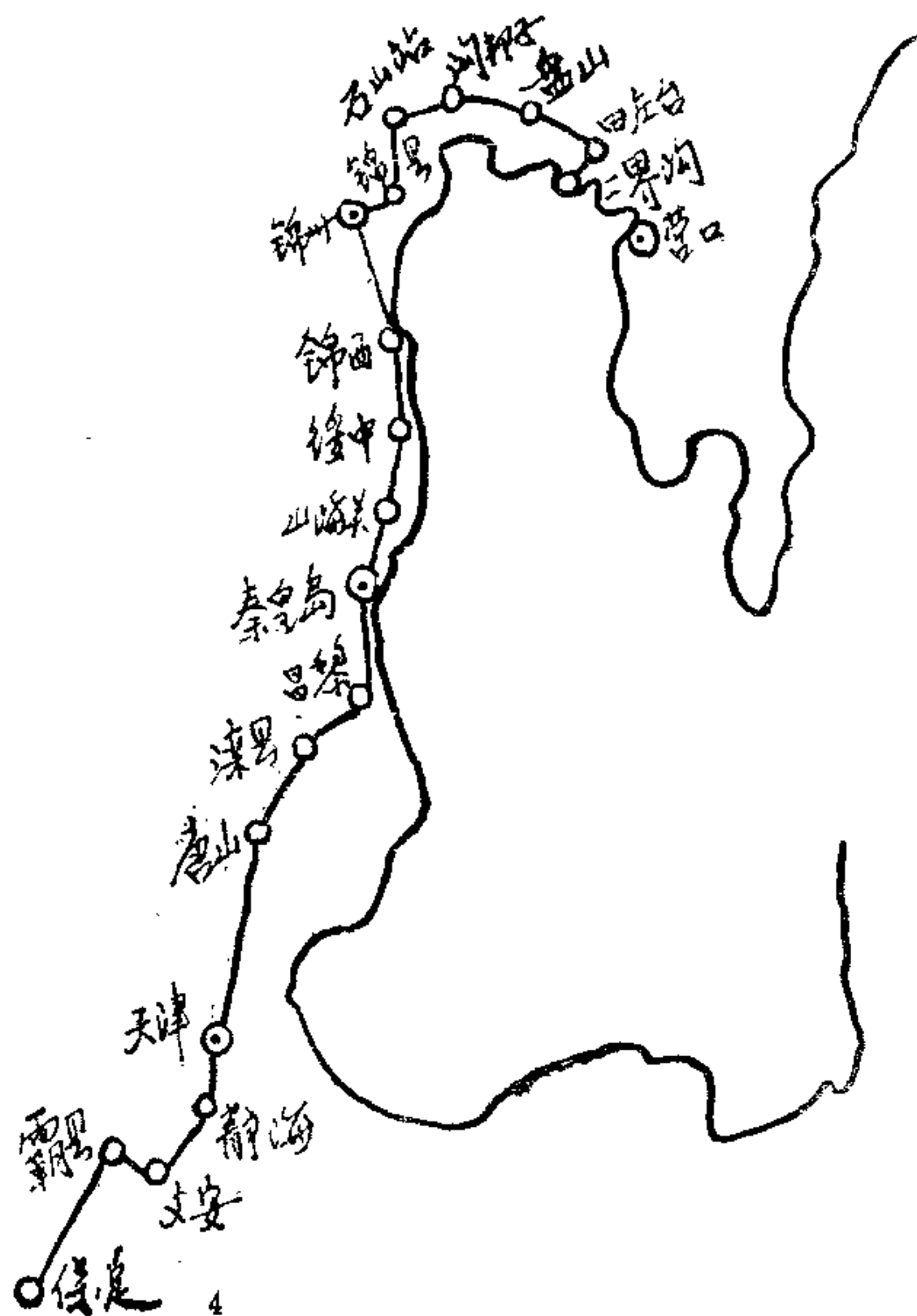
捕鱼集中的地方。他们象候鸟一样，春来秋返，由海上来的称为“水雁”，由陆上来的称为“陆雁”。每年春天“水雁”来时，海湾里漂来一座座桅樯如林的船城；从陆上来的要经天津、唐山、山海关，进入辽西走廊达海城进入辽东湾二界沟渔场。至秋末又沿原道返回。（见4页图）最兴盛时，明朝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多达千户船。这些渔民绝大部分是河北省文安县、白洋淀、静海县、霸县和山东、浙江省人。从陆地来的渔民都是结成队伍，集中前往，以防匪劫。他们在每年正月初五左右出发，车载人担，行程千余里，数十日，到达目的地。这种“渔雁”式的生产型，延续很久、很久。渔民每年春来秋返，很不经济，有人就想到在此定居。早在明朝后期，就有自黄河、长江岸边北上打鱼的人在此定居过。在潮沟两岸曾发现古渔村遗址：一处叫红草村，一处叫沟北村。一五〇八年双台河口地震，此渔村随即荒废。清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九年），山东渔民曾元亮在红草村废墟上建铺下海，起名曾家屯。到了清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又有一些渔民在沟北建铺，仍叫沟北村。由于海产丰收，来至此地捕鱼人逐渐增多，有些渔户在冬季围海筑堤建造网铺。到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沟南村已呈雏形，随之形成了两村夹一沟的村屯形势。由于沟南距西大沟下游近，入海方便，沟南村渔户日益增多，沟北渔户也逐渐向沟南靠拢，直至消失。现在的二界沟渔镇就是当年的沟南村位置。二界沟虽地处大洼县，但村里人的口音却和大洼人不同，多是外乡口音，因为大多数是从关内来的。据考察二界沟曾三易渔民，其口音发生变化。最初，在明朝成化年间（1478年）。来二界沟捕鱼的人多是陕西的，因经营不善，他们另

换鱼场，迁移到黑龙江去了。随之又有保定府的渔民迁来，生产了一个时期又迁到鸭绿江口去了。至清朝嘉庆初年（一七九六年），河北省滦县大庄河渔民张、刘两姓迁入二界沟。他们捕鱼得法，收入较多，有较强的竞争能力，逐渐积累和形成产业，建立网铺，世代居住此地。现在二界沟人的祖籍多是河北省滦县人。因此该地渔民的语言仍属河北原籍口音。

二界沟渔村的渔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渔民们用非常简单的渔具，在海滩近处捕鱼为生。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渔民逐年增多，捕鱼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逐渐到近海以小渔船和小型“档网”截捞鱼虾。随着收获量的增多，开辟了海上渔业贸易市场，发展了商品生产。到清朝道光年间（1830年），该村有5至6吨位的渔船三十只左右，木橈约计一千二百多棵，从此开始改档网生产为橈张网生产。当时生产关系虽属个体经济范畴，但渔户们为了便利操作，捕获更多的鱼虾，自动由四、五家渔户联合起来，共同操作。当时叫做“打伙”。每船约有四至五人，除船长的报酬略高一些外，其余的人则是平均分配。并在岸上设有8至9人处理产品和补织网具。这种分工合作使该村海水渔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随着海水渔业生产的发展，一些乡镇的有钱的农、商户见到有利可图，遂投放了大量的资金，在二界沟开设了网铺，置网置船。他们雇用渔工，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勾结，对资金少，生产工具简单的渔户进行排挤，致使一些渔民纷纷破产，同时也有少数条件较好的渔户发展成为渔业资本家或小业主。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界沟就有网铺50。

魚雁行示意图



多户，拥有渔船70多只，雇佣渔工上千名，每年单船生产量约30万斤，总产量约2000万斤以上。这时渔具又有很大改进。特别是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历经“千难万险”创造了风网、挂网、橈张网等10余种捕鱼方法，使捕鱼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1875年前后，是二界沟渔业生产的最盛时期，每年总产量达3000万至4000万斤左右。当时大网铺主称为“黄金时代”。尽管渔业生产发展了，但渔民的生活确直线下降。大部渔民由于遭到大网铺的排挤，变成了渔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天省府设“渔业商船保护局”，二界沟设有“台沟分局”，并在田庄台下设销售场，驾掌寺包场。台沟分局主管该地渔业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设立渔业销售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渔民也发生变化，优胜劣汰，相互兼并，强者拥有资本，占地建铺，增加网具，扩大海田规模，称为业主；弱者被强者雇佣，形成渔工。到民国三年（1914年）该村就出现不少破产渔民，给网铺当渔工，过着劳累饥寒的生活。但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又从关内迁来了一些户（扩大了村落）已达近百户。民国七年（1918），二界沟出现第一任“百家长”——刁宝云。

民国时期，该村的渔业生产时起时落，但总的同1875年间比，是衰落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二界沟仅剩有渔户33家，大小渔船52只，年产量下降为130万斤至150万斤。当时作业多用橈张网、光腿网、风网、挂网等10余种工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对二界沟渔村渔业生

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并于1934年以伪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对一般产业的声明》中指出，“须经许可才能经营产业，其中包括渔业生产”。这一时期，二界沟渔业生产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渔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呈现衰落，有的渔民外逃。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二界沟渔村设村公所，村长刘德友，职员有：刘国章、解恩武、何正刚等。

1936年，日本侵略者在二界沟成立了“水产交易市场”，严格地控制水产品的交易。1937年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又在二界沟成立了“渤海株式会社”，强占了二界沟最好的六排网地，全面地控制与掠夺了水产品的交易和生产。大网铺主纷纷抽走资金，缩小经营，或转入它业。广大渔工在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则以“不出海，晚出海，不按时间倒网等种种斗争方式，降低产量，因而渔业生产一落千丈。日本对我国海资源掠夺大大减少。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二界沟渔场仅有网铺20多户，渔船20多只，年产量仅达100万斤左右，比1939年下降20%。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领了二界沟，成立国民党支部，书记刘子兰。这一时期，渔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官僚、劣绅等八大渔霸控制了全部渔场，对已有的小网铺、小业主和分散个体生产者，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排挤。绝大多数的渔民弃行转业，劳动力大为减少。至解放前的1947年，仅剩下网铺17家，渔工还不足400人，渔船20只，生产量比日寇统治时期的1943年还下降30%左右。1948年，二界沟渔村解放了，成立了渔民会。当时该村归田庄台镇管辖。这时二界沟的居民户数不断增加，渔业生产又开始繁荣了。

二、渔村的生产发展概述。

1、船只与网具。

二界沟船只很多，种类不一。每只船起的名号也都很有讲究。无疑是盼望发财和求得平安无事的缘故吧。多用顺乎发家兴盛的佳词做名。据收集到的清末年间的船名有以下几种。其中有：海隆、海丰、海顺、永和、永顺、福兴、福康、福海、永泰、永利、昌丰、昌顺、玉顺、德顺、万顺、福顺、福源、利源、永庆、永丰、永绥、东宁、东顺、泰顺、泰安、福盛、福泰、万利、万昌、海昌、守安、顺通、顺绥、永兴、和顺等等。此外，那些穷门小户的船落名，尽管讲究不起，名字也叫得动听，大多以自然界的鸟类和动物命名。例如：小牛、黑熊、大象、山虎、大羊、山猫、野兔、獾子、猴子等；以鸟类命名的有：黑老头、小鸥、大鹤、沙溜子、山鸡子；也有以植物命名的有：大白菜、葫芦瓢、南瓜、萝卜叶、韭菜叶等。还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那就是谁家的船，叫谁的名字。有的船名起得非常有趣。例如，正要给船落名的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嘎嘎”地呼叫着飞过，无疑船叫“雁鸣”了。他们将船的种类命名为：马槽、花鞋、二人灯、门定子、猪槽子、雁飞、小尖咀等。

清道光壬午年（1822），二界沟的头号大网东“万福”家，一连排了八条新船。新船下水落名，设宴三日，专找刚会说话话的八个童男，给船起名。在每个孩子被抱上船后，喳喳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船名。每得一名，网东赏银数两，祝贺一番。其中有个孩子抱上船后，很长时间不喳喳

话，无论大人怎么逗引，也不开口，正要换一个孩子的時候，这孩子突然发出个“zū”的音。此音一出口，一些捧场的老学究就说这是与“福”字同韵，恰合“福”字，便落了船名为“万福”。

今天，二界沟渔民使用的网具，除了线、绳、网浮子方面有些进步外，形状仍是原来的模型。现从二界沟渔民手中收集到网具名称有：蛤叉、推网、海螺网、棍网、扞网、堵沟网、绳网，单钩（又称手撩）、族网、光腿网、木笛网、须毫网、夏网、船张网、石锚网、悬网、曾网、搬网、周网又名围网、转周网鲁网、泰吊网、撞兜网、滚网、潭网等。近时期网具又有所发展。如：风网、流网、挂网、蚊鲸网、扒拉网、崩网、泼网、快钩、滚钩、海蜇网。带高腿子的浅水网有：扑网、大投网、光腿网、蒙子网。用苇薄做的鱼具有：小边绷、笊把、转绵、卡子钩、罩、拦等。以橈杆做渔具的浅水网有：笨张网、橈张网、亮网、落网、衣挂网、小亮网。还有无橈杆的定置网（即绳网）如：扒网、衣张网、大桶网、甩袖网、蒙虾网、大拉网、大网、坐闸网、裤裆网、拉蛎网、张虾网等等。其中橈张网是二界沟捕鱼工具的主要网具。数量很多，使用广泛。

以上几十种网具，由于渔业生产的科学发展，生产捕捞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有些网具随之而淘汰。二界沟渔民过去使用的渔网，起初是粗绳网，后来逐渐变成了细线网。这是网具的演变过程。细线网轻，捕捞效率高。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细线经水一泡就会变松变软，容易折断，过水缓慢。为解决用线网的弱点，渔民发明用动物血浸渍网具增加硬度，并增强了抗腐力。血网技术的发明，使捕捞业进一

步振兴。自从棉线网被胶线网代替后，血网的历史随之结束。网具的每一次更新，都给渔业生产带来生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网东与网铺。

解放前夕，辽东湾海域沿岸的网铺多集于二界沟渔村。大多数网东除在海边建铺经营渔业外，还在大城市里经商。内陆有庄园。清宣统元年（1909年），二界沟仅有三十一户网东，二十八户在河北省有庄园，三户本省有土地。十三户与大官僚有亲属关系。十户分别在香港、北京、广州、秦皇岛、海城、天津、塘沽、锦州、沈阳、通江口等地有商号，从事油、粮、杂货等买卖。大网东一般不住在二界沟村，都住在城里，网铺由经理人代管。有的只是到了海鲜上市来一趟，吃喝玩乐数日就走了。有的网东甚至几年也不到海边来一次。网东只是到年终时过问网铺情况。个别网东大包给手下人。网东与网铺管理人的关系，看上去表面上是相互利用，其实，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网东在建铺后，都要给网铺起个吉祥的字号，素称“渔号”。清宣统元年（1909年），二界沟渔村的网铺字号及网东的姓名（括号里是网东姓名或绰号）如下：福太（杨希理）、永昌（杨希永）、万成（大绿裤）、德发号（杨希振）、小玉泰（玉兔子）、永泰号（李春巍）、玉成河（杨希印）、广增隆（外号眼脑歪）、李龙恩（李龙恩）、合茂永（名不祥）、成发顺（牛景山）、福增永（刘级三）、长发福（修雨汀）、永顺增（杨有春）、福源顺（刘贯英）、永顺昌（杨树礼）、福昌顺（吴庭臣）、义合源（李恩绩）、永合增（杨静山）、福泰永（杨立栋）、顺增东（杨

希震）、永成泰（李继先）、福发永（牛富贵）、万发顺（孙雨权）、德发盛（杨希昌）、永昌号（杨立芳）、恩发顺（王凤恩）、玉德顺（刘玉）、福裕顺（杨墨林）等二十九户，共有大船五十五只，渔民二千零二十七人。每个网铺都有管家或经理，下设若干人。有料理帐目的，有处理事务的，有管销售或捕捞的，有看货或保家的。当然在网铺中也有吃闲饭的。如管家的家眷及闲杂人员。每个网铺卖苦力的渔工就有几百人。

过去的二界沟渔村，网东与网东之间，网铺与网铺之间，无时不存在尔虞我诈，表面上还过得去，其实无不是明争暗斗。清光绪年间，辽东湾海域曾出现过一个出类拔萃的、治理渔事和管理网铺的“铁腕女人”。有一个网东，铺号叫“福顺昌”，东家是杨满氏（女），在二界沟渔村和辽东湾沿岸一带很有名气，是一位善于经营渔事的女人，官府里平趟，就连海匪也不敢惹她或劫她铺的船。谁说不是渔会会首，但在众网东组成的议事会上，也是说一不二、举足轻重的人物。网东们称赞她，做事干净，办事爽快。原来在网东之中一个弱小的“福顺昌”网铺，经她手治理后，不过数载，竟变成个富豪的网铺了。

网东之间的角斗决定了网铺的兴衰。而“抗水活”的渔民不论挨上哪个网东也都是受欺，被当作奴隶，拼死命的干活。老一代渔民说：“网东的福，是渔工的苦；网东的增，是渔工的空；网铺的昌，是渔工的光；网东的盛，要渔工的命。”

3. 渔场与渔市。

自明清以来，二界沟渔场一直延续到今。富饶的辽东湾

海域是渤海最优越的渔场。它地处辽东湾的东北部，南起营口，西至葫芦岛，位于北纬四十八度四十九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五十八分之间。主要渔场面积，南北约三十六里，东西宽二十五里。海底属泥质，坦平，落潮时水深二丈二尺，满潮时三丈八尺，潮汐差一般在八至九尺。潮流方向自东南——西北。流速平稳，无巨大风浪。这里水源肥沃，渔场富饶，是鱼虾回游繁衍的好地方。春夏秋三季里，水不冷不热，大片的泥滩繁殖着鱼虾所需的天然饵料。又有双台河、大凌河、辽河水注入。每年有很多种鱼虾回游生长在辽东湾渔场。这里鱼虾生活习性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远程回游习性的鱼虾，它们伴随着季节的变化成群结队地有规律地回游。另一种鱼虾是一年四季不走，游居在本域的宽阔的鱼场里。据1932年的《公务年报》记载，仅二界沟二十户网铺，每年捕鱼虾量达五百万斤至七百万斤。可见，过去这个渔场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辽东湾海域渔场又分为深水和浅水两种：一是浅水定置渔业。这些渔场均被二界沟的网东所占有，同陆地土地一样，官府发给特殊证明（执照），有继承和买卖的自由。各网东有固定的下橈子地方。作业捕捞也是有固定范围的。二是深水游动渔业，这种海面官方仅认为渔业者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属于国有。清光绪年间，二界沟的定置渔业场，有：无神岗，西岗边，东岗头，大流子，贾例子，小东岗头，条子岗，二三排，东大坑，五蹬、西大岗，小流子，五蹬三排，哑巴岗，桃花岗，东大开，三排橈，西岗外，盘山河口等。海田不同于农田界线分明，那时，网东间常常为争夺渔场霸占更多的海域而发生纠纷。这些事例每年都有发

生。据伪康德三年二界沟渔会《会务年报》记载，二界沟的网东在渔场上发生四起纠纷：一是“顺增东”与“福顺昌”，二是“福昌顺”与“长发福”，三是“恩发顺”与“裕德顺”，四是“恩发顺”与“裕德顺”。其中，“恩发顺”与“裕德顺”的纠纷气势最凶。两家渔场自秋渔开始以来，互相争持，两者渔场均被侵。曾由渔会会长几次调节，令“裕德顺”拔橇二十株，唯“恩发顺”坚不认可。九月二十九日，“恩发顺”经管人王凤恩，突以书面通知渔会，擅自出海解“裕德顺”网铺的网；一面诣呈海边保护局的十三号船，请求保护执行。徐董事、孙副会长闻讯，急与十三号船长接洽，研究应急的处置之方案，并要依渔会行政程序处理。十月一日，孙副会长和徐董事，于早五点出海履勘，晚九时与当事双方及十号船“阿部”警士作重要恳谈，反而事态扩大。于当日下半夜一时二十八分，经召集紧急役员会（第十七次会）研究结果：决定由“裕德顺”拔橇三十株，而由该会要求“成发顺”、“永顺增”，“永昌号”，“长发福”，“义合源”等分担拔橇船工，并由该会为“裕德顺”指定渔场。从而平息了此次纠纷。

二界沟地处辽东湾渔场最佳位置，渔场辽阔，开海时节，外地渔船蜂涌而来，渔民数以千计。在很早以前，随着渔场的发现，这里产生了渔市。因为到辽东湾渔场的船只大多数是家眷船，他们的船只走到哪里哪里是家，所以那些卖粮、卖线、卖口用品和运输海货的买卖船纷纷入港。喧闹的海上市场为这个渔村增添了繁华的景象。由于陆地居民户增多，以及每年徒步而来的数千名关内渔工，逐渐由水上海市发展到陆地渔市。二界沟三面环水，一面靠滩，唯有一条小

径，通往三十多里外的小镇田庄台。旧时，两地的鱼贩相互做买卖，海产品源源输出。同时，大网东都建立了加工鱼虾的铺子，经过加工的鱼虾运往全国各地，繁荣了经济。因而二界沟素有“日进斗金”之称。

4、海产品种类与特产。

二界沟渔村的渔场是我国沿海地区著名的捕捞渔地之一。海产品种类甚多。其中有：黄花鱼、带鱼、鲛鱼、鲈鱼、鲭皮、对虾、虾爬子、大头宝、海蜇、文蛤等主要海产品。另外还少量产有鲑鱼、鲟板、梭鱼、狗虾、青虾、红虾、白虾、勒鱼、石条鱼、光板鱼、小丁鱼、老头鱼、燕鱼、小刀鱼、洋鱼、白姑鱼、铜罗、花鱼、小贝贝、蚶子等同时还加工盐干品毛虾、大海米以及虾酱、虾油等。其主要特产是毛虾、文蛤、海蜇等产品。据伪康德三年（1936年）二界沟渔会《年务会报》记载，全年加工盐干品毛虾三百万斤，大海米三十万斤，杂鱼二十万斤。当时该村有水产品制作厂一百多处。

5、捕捞与经营的状况。

二界沟渔民下海捕捞完全遵循着节气变化和鱼类回游变化规律来进行。每年开春，大雁飞来，沿岸掠过，汹涌的春潮，拱碎封锁港湾的冰排，并一块块地推进大海，这一天就是打鱼人的开海日。一般在每年的三月中旬左右，二界沟的户户网铺的条条渔船就下水出海了。先是由渔会组织网东与渔民到龙王庙拜四海龙王。拜龙后，又抬着供品到海边，在一片鞭炮和锣鼓声中扔进大海。再回到船上，开始贴对联。渔民在桅杆上贴上“大将军八面威风”；如果船上有两桅还贴上“二将军头前带路”。船头贴的对联有：“船头压浪行千里，舵后生风越九洲”，“海宇多锦绣，青波卧渔

舟”，“欲卜今岁海田好，喜望丰收鱼虾多”，“船身坚固载万担，众志成城捕鱼多”等。横批有：“一帆风顺”，“鱼虾满仓”，“船头压浪”，“满载而归”，“船得风顺”等。同时还要树“顺风旗”，“顺风旗”是网东铺号的标志。旗杆高十五米左右，龙头镀金（长二米），龙尾长一丈五用绸布而作。各网东“顺风旗”的做法大致相同，但在色彩上各有特色。同时各网铺的船桅顶部都树有跟自家铺上色彩一致的小型“顺风旗”。每在“顺风旗”树定时，网东或管家要带领着家眷、渔民敬仰片刻后，随令开案（开案是船上、陆上，渔民在一起吃一顿大锅饭）。开案后，在锣鼓鞭炮中扬帆出海。

过去打渔人在天连水，水连天的大海里走船撒网，要准确地走向渔场或收进码头。他们是白天靠太阳，晚上靠星斗。但是一旦遇到阴雨大雾天，打鱼人凭航海经验也不会迷失方向。渔家撑船，行至大海往来自如。判定潮汐的准确程度是二界沟渔民的拿手戏了。自古以来，渔民把白天谓之潮，晚上谓之汐。一般坐在仓里都能算出一个月的潮汐水位，还编出几句顺口溜：“初一、十五正晌午，初八、二十三涨到晌午落黑天。”根据潮汐的规律，利用潮流撒网走船是渔民的常识。过去的二界沟渔民在选建网铺和住址上，足以说明对潮汐科学利用的恰到好处。乍一看，古代渔事兴盛的二界沟，建址在荒无人烟的沙滩上，左不靠城，右不挨镇，即不守在河口，更不钻进河套。为什么偏偏建在离河口较远，又是死沟洞的地方，似乎不合乎情理。但是，仔细一琢磨，就会悟出道理。要知道，潮汐特别遵守时间，每隔十二个小时二十分一次（一涨一落），一天两次。四个流

循环往复。渔民是落潮出，涨潮归，顺应潮流，即省力又安全。渔民讲：“船出海，遇上顶头风，只要鱼筐拴上绳子，扔下水里，靠潮流也能将船带进渔场。真是，“潮退船出海，潮稳起丝网，鱼虾装进仓，潮涨转回家。”潮汐为渔民提供用之不绝的天然能源，为渔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界沟渔民对船的使用是有一定规矩的。不滥用船力和人力。一只渔船，渔民总是根据船的大小，需要占多少人，都有要求，钉是钉，铆是铆，多一个无活干，少一个忙不过来。此外，网东常在陆地上备一些人，是用来专门替换船上临时有事或生病的人出海。一只船有多大，它上面占的人和船上的帆，锚也是相应的。绝对不可能小船带大锚，那样船在浪里行驶船头容易捣猛，小船带大蓬，船小蓬大，风来了船要翻跟斗的。相反，大船上又不能备小锚，做小蓬。渔民在作业和走船上的分工是有严格区别的。因为在过去科技不发达，每次出海都有着同险风恶浪作斗争的情景。哪怕是一个关节上出点差错，都事关大局。渔民说：“行船就打架，收港就说话。”说明船上工作的紧张与激烈。在分工上，是有等级的。如一条船五个人，船上分工是：船长（把头），付船长（揽头的），大仓（起网的），二仓（协助起网的），伙仓（起网时装鱼排虾，网起完下仓做饭）。大船分工则是更细。船上的职务不是终身的，新上船的伙仓干好了，一步步升为船长，船长上年岁可降为伙仓。

渔民在海上行船作业或说话和陆地不一样，有些“忌言”。比如说：不许说“翻”字，把“翻”的音叫“划”，不许打口哨，因口哨是风的呼啸，渔民是不喜欢响哨的大